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生平和著作

德 年



(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现代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于美国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弗兰德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北京

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斯特朗的父亲是个牧师，母亲是当时当地少有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之一。斯特朗自己，曾先后在美国的三个大学里读书。一九〇七年，当她二十二岁时，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是在这个学校获得这种学位的最年轻的一个。

斯特朗在进大学前后，直到一九一五年，不断从事写作、编辑和儿童福利展览等社会工作。她在二十岁以前就善于写诗。早在一九〇四年她就出版了一本诗和寓言集：“Storm Songs and Fables”（风暴之歌和寓言）。一九〇六年她把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诗汇编成诗集：“The Song of the City”（城市之歌）。这些诗直到现在还是具有生命力的，是她青年时代的聪明才智的结晶。

一九一五年，斯特朗辞掉了华盛顿联邦政府儿童局的“儿童福利展览专家”的职务，回到了西雅图家里，参加反对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成了美国西部，特

别是西雅图市的一位反战运动领袖。她在当地活跃的政治生活中，很快地作为一名“进步的候选人”被选入了市教育委员会。她是这个委员会多年来的第一位妇女委员。

美国的人民要和平，但是它的资本家要战争；美国终于参加了欧战。美国的参战，打破了斯特朗以及其他许多美国进步人士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的消失是取得了补偿的，她说：“我们也成了世界革命的接班人”。十月革命的雷声震醒了世界，远在美国西北部的斯特朗也从莫斯科得到了革命的信息。她开始为一家革命报纸《西雅图每日呼声报》义务写稿。这家报纸靠借债和募捐维持了九个月，最后为一帮流氓所捣毁。随后她又担任了一家更有声望的报纸，《西雅图工会纪录报》的编辑。这家工会报纸有力地帮助和领导了当地的工人运动。斯特朗在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革命情况的材料，使这家报纸成了美国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家报纸。她并且在这个报纸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作“Ragged Verse by Anise”（安妮斯打油诗），每天在上面登一首诗，用诗作为评论政治的战斗武器，成了这家报纸的一大特色。她的诗不但在国内到处被传抄，而且也流传到了国外。一九二一年莫斯科就是主要由此闻名而邀请她到苏联的。三十年后，在一九五一年，她又从这些诗里（约六百首）选出了三十首，编成诗集，并以其中一首诗的题目作为书名：“God and the Millionaires”（上帝与百万富翁）。

一九一九年，她参加了有名的西雅图总罢工，声援造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她为总罢工委员会写了这次罢工的正式历史文件：“The Seattle General Strike; An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in Seattle, and Especially in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During The General Strike, February 6 to 11, 1919”（西雅图总罢工：关于西雅图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至十一日总罢工期间在西雅图劳工运动中发生的事件的报告）。

那次罢工，看起来象是胜利了，实际上，工人运动却从内部衰败了下来：政府撤销了合同，关掉了船坞，工人们被赶到别的城市里去找工作。“我们劳工协会变成了木工和铅管工争夺职位的场所。我们那出色的工会纪录报修改了办报方针，以适应登广告人的口味，‘同志’间互相指别人是叛徒。‘工人权力’成了个什么样子了！”斯特朗意识到他们是失败了。但是，俄国人却成功了。他们是怎样成功的？她要去亲自看一看。

（二）

一九二一年，斯特朗到了苏联。



她先是作为美国公谊会的工作人员到了那里，随后又作为西雅图劳工协会的观察员，参加了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最后她在莫斯科定居下来，在这以后的

近三十年中，她写了许多书和文章，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报道苏联的革命。

她不仅写文章，同时也是一个实际革命工作的参加者。一九二一年，在她为美国公谊会工作的几个月中，她把第一批几车救济食

品运到苏联，救济伏尔加河萨马拉区的灾荒。

在救灾工作之后，她又协助组织了“约翰·里德儿童农场”，收容伏尔加河流域无家可归的孤儿。在以后的一些年间，她经常回美国为这个农场募集捐款和农业机器。一九二五年，她为此写了一本书：“Children of Revolution; Story of the John Reed Children's Colony on the Volga, which is as well a story of the whole great structure of Russia”。(革命儿童：伏尔加河流域约翰·里德儿童农场的事迹，同时也是俄国整个伟大结构的事迹)。她把出版这本书的全部收入用来增印这本书，并捐助了农场。

这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来到苏联，参加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些人的需要，她发起并组织出版了“Moscow News”（莫斯科新闻），先是周报，后来发展成为日报，她是该报的编辑。这个报纸不但对在苏联的美国人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它也是在苏联出版的第一个英文报纸，广泛地发行了到国外。对于在三、四十年代关心苏联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中国人，《莫斯科新闻》也是很熟悉的。

就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斯特朗和一个苏共党员结了婚。她的丈夫也是一个作家和编辑，斯特朗自己这样说：“他没有改变我的工作的性质，而是激励并帮助了我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特朗在美国时，他死于乌拉尔。

在以莫斯科为活动中心的将近三十年中，斯特朗经常往来于纽约和莫斯科之间。每一年或两年，她总要回美国巡回演讲一次，每一年间，她至少要在苏联住上半年。她每到一处，总是和当地人民同吃同住，深入实际，体验生活。一九二二年她同第一批带头到北极圈开采云母矿和长石的人们在那极寒地带安搭帐篷。同年她又往南到了顿涅茨河谷，同长年站在水里回收煤矿的工人生

活在一起。然后她又到了丰产石油的巴库，亲眼看到生活在极度困难条件下的总工程师和其他人们，怎样在忘我地工作着。她就是这样在一年中遍访了五个民族不同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卡累利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这些共和国的人民都在为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家园而艰苦奋斗。

这样，就在实地生活体验中，她写出了“*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wo Years of Russia's New Life*”，（历史上的第一次：俄国新生活的两年）。

在一九二八、二九、三〇年间，斯特朗访问了苏联的中亚地区。这之前，没有别的外国记者到过那里。那里的妇女，渴望有人告诉她们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情况；她向她们介绍了遍及全世界的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访问中亚萨马尔罕之后，她写了“*Red Star in Samarkand*”（萨马尔罕的红星）。

这以后她又到吉尔吉斯，到帕米尔高原旅行，那里很少有英美人到过。在帕米尔她看到了十年内将在苏联消失的旧时代的游牧部落生活。一九三〇年她出版了“*The Road to the Grey Pamir*”（通往灰色帕米尔的道路）描绘了这个地区的迅速变化。

一九三〇年她还出版了“*The Soviets Conquer Wheat*”（苏联人征服小麦），报道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进展。

一九三一年她把她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过的一些描写苏联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短篇特写编成一个集子：“*From Stalingrad to Kuzbas*”（从斯大林格勒到库茨巴斯），反映苏联工农业向着第二个五年计划前进的迅速增长。

一九三六年她出版了“*This Soviet World*”（中译本：《人的新世界与新世界的人》，李铭等译，上海潮锋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出版），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一九三七年出版了“*The New Soviet*

Constitution: A Study in Socialist Democracy”（苏维埃新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论述苏联新宪法的历史、内容和意义。

斯特朗在苏联期间还写了大量小册子，如：美国Haldaman—Julius出版公司的“小兰书”丛书中的“*How Communists Rule Russia*”（共产党如何统治俄国），“*Marriage and Morals in Soviet Russia*”（苏俄的婚姻与道德），“*Peasant Life in Soviet Russia*”（苏俄农民生活），以上第二、三两种合并起来有中本译本：《苏联农民与妇女》，叶鸿译，一九四五年秋阳版。此外还有“*Workers' Life in Soviet Russia*”（苏俄工人生活），“*How Business Is Carried On in Soviet Russia*”（苏俄的商业）等等。又如纽约“*International Pamphlets*”出版的“*Modern Farming—Soviet Type*”（现代农业—苏维埃类型），“*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 the Soviet Union*”（苏联的专政与民主）等等。这些小册子主要是为了向美国人民介绍苏联各方面的情况的。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斯特朗在美国，一时回不到苏联。她在好莱坞签订了一个短期合同，为协助一部影片的摄制，担任了“俄国专家”。这之后她就住了下来专门写书。她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写了下列的三本书，来总结她对苏联的认识：

一本是一九四一年出版的“*The Soviets Expected It*”（苏联人预料到了），论述苏德战争的起源、背景和战争将怎样发展；说明了苏德关系上的种种问题，把苏联人民的



精神面貌多方面地描绘了出来。

第二本是一九四三年出版的“Wild River”（澎湃的河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这本书在美国哄动一时，出版后的一个月间就重印了三次。

第三本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Peoples of the USSR”（多民族的苏联）。她是那个时期访问过十六个苏维埃共和国中的十五个的唯一的美国人。她写这本书向美国青年介绍苏联各民族丰富多采的生活和斗争。

（三）

斯特朗不只是注意苏联的革命，她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阅历非常广泛的作家和记者。在她的一生中，那里有革命，她就到那里去。她对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怀着深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她走遍了世界各个闹革命的角落，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和种种危难险阻的考验，通过她的手和笔，世界各地的革命的发展景象，被她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而又迅猛增加到了四分之一的中国，自然始终是她最为关心的一个国家。她前后一共访问了中国六次。此外，在她年年往来于莫斯科和纽约之间的那些年代里，在她经过的路线上，她还访问过许多别的国家的革命：西班牙、德国、墨西哥，立陶宛，波兰，北朝鲜、东欧等许多国家，她都去过。就是在七十二岁的高龄回到中国以后的一些年代里，她还访问过越南和老挝。就是在她逝世前不久，她还计划着出国旅行。

一九三六、三七年间，她两次访问了内战中的西班牙，她在战壕里和马德里的医院里向世界报道西班牙的革命。她把访问的结果写成了书：“Spain in Arms—1937”（战斗的西班牙——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〇年她从美国回到莫斯科时，她先通过欧洲战区，从意大利、德国进入立陶

宛。当波罗的海的几个国家加入苏联时，她正在那里。她乘着申请加入苏联的立陶宛代表们的专车，一同到了莫斯科。她写了“Lithuania's New Way”（立陶宛的新道路）。

一九四四年欧洲的交通线还不正常。她从美国的弗尔班克斯坐上一架租借法案的运输机，飞越北极圈，回到莫斯科。她是走这条道路的唯一的新闻记者。

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间，她随同卢布林新政府的人员从莫斯科进入波兰，访问了华沙—布拉格，访问了那时的东方战线。沿着维斯杜拉河的战壕，迎着枪林弹雨，她在战地的视察。当苏军跨过波兰，攻到奥得河以后，她在罗兹，从那里的临时后方基地向世界报告战况。这期间，她写了“I Saw the New Poland”（中译本：《新波兰游记》，李亚译，东北书店一九四七年版）。



一九四七年夏，她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然后换飞机到北朝鲜访问。她是日本占领朝鲜直到朝鲜抗美战争之前，唯一到达这里的美国记者。访问后她写了“Inside North Korea”（北朝鲜的里面），“I Saw the North Koreans”（我见到了北朝鲜人）等小册子和文章。

（四）

斯特朗对于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总是寄与国际主义的同情；对于中国革命，她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一九二五年，正当她四十岁的时候，她从莫斯科第一次来到了

中国。那时正当省港大罢工期间，她是唯一的外国记者看到了一九二五年中国革命的开始。

两年以后，中国的大革命席卷了长江流域，斯特朗又从旧金山回到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她坐着德国船，顺长江直到武汉，访问了那里的革命政府。几个月之后，在镇压农民的白色恐怖中，她又访问了湖南。她是唯一的外国作家，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到了那里，并带回来农民革命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她亲眼看到了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叛卖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武汉政府垮台后，她随同俄国顾问乘汽车穿过大西北和蒙古沙漠，横贯三千公里，直到莫斯科。

关于这头两次访问，斯特朗写了两本书“Mass Revolt in Central China”（在华中的群众起义）和“From Hankow to Moscow”（从汉口到莫斯科），用俄文、英文和德文等三种文字发表。在美国出版时，这两本书合并成了一本：“China's Millions”（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一九六四年，她在中国朋友的建议之下，计划编印她的作品选集，分六集出版；并在她的八十岁生日之前出版了第一集。这一集包括“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前一部分：论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同时在这之前增加了一章：“Canton Prelude”（广州序曲），辑录了一九二五年写的第一次来访的文章。

一九三七年底，正当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访问。她到了山西临汾附近的八路军总部，不但第一次会见了朱德同志，并且还会见了参加敌后地区军事会议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同志。她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新型军队；她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向世界报道了人民军队的成长和胜利的前景。她说：“他们正在取胜，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向仇恨丘八老爷的农民的全力支持。共产党使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兵士，他们从不奸淫抢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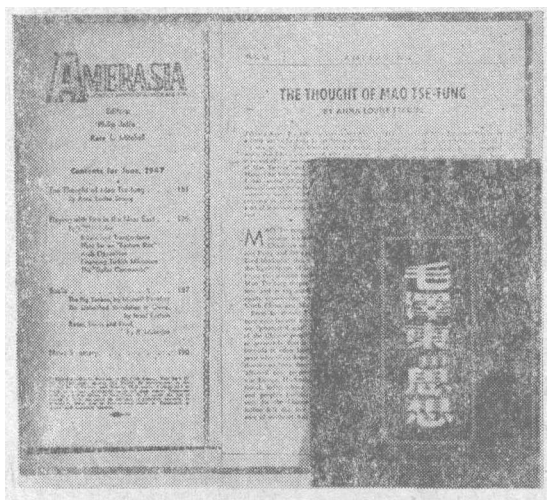
而是尊敬农民，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而且特别是还教育人民，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教他们怎样进行战斗以争取胜利。”访问后她写了：“One Fifth of Mankind”（中译本：《为自由而战的中国》，伍友之译，棠棣社一九四〇年二月三版），她满怀信心地预示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前景。

一九四〇年底，斯特朗乘飞机从阿拉木图飞到重庆，这是她第四次来访。她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线的外国记者。这时蒋介石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制造内战，中国革命又处在紧要关头。斯特朗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向她提供了已经继续了两年的国共武装冲突的情况。斯特朗带着这些材料飞过日本防线，经过香港，回到美国。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斯特朗在纽约各报大字标题的新闻中发表了“蒋介石不再统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也不再指挥着一个统一的军队”的事实真相。她还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更详细的报道。那时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和国共冲突的真相，斯特朗是第一个向西方揭露事实真相的外国记者。她在《美亚》杂志上写的文章的题目是“The Koumintang—Communist Crisis in China; A First-hand Account of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Periods In Far Eastern History”（中国国共两党危机：远东历史上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的第一手材料）。

一九四六年六月，日本战败后，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访问。她坐着改造过的，没有座位的美国军用飞机，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这时蒋介石正在公开对中共作战，马歇尔企图用调停手法把共产党排挤出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土地。这时，只要拿有记者证的美国记者，都可以免费乘飞机到中国内战中一切有争议的地方去旅行。于是斯特朗就马上决定只要这种情况延续多久，她就在中国停留多久；共产党解放区能访问多少，她就访问多少。

就这样，她坐飞机在华北和东北的几个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在延安住了好几个月。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同她作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发表了著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在延安时她还会见了刘少奇、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并进行了多次谈话，根据这些谈话，她写了一篇重要文章：“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这篇文章马上被译成了中文：

《毛泽东的思想》。英文原文发表在纽约出版的《美亚》杂志一九四七年六月号上，并出版了单行本。



关于这次访问，她自己说：“我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度过了那年冬天。……我能解释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永远住下去吗？那里没有讲究的设备，很少物质享受，那里有的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具有全球眼光的人。……我从来没有像在孤立的、被困的延安时那样，感到距离建设世界的人类威力那么近。”

“当我离开延安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这主要是在延安讨论各种问题当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胸在不断开阔了起来。”

她是一九四七年初离开延安的，那时八路军正在撤出延安，进行战略转移。那时毛



主席亲自对她说，她已经了解解放区的所有情况了，她“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联系时，你可以回来。”毛主席特别要她把共产党的情况传到美国去。

斯特朗从延安到了上海，把解放区的情况写成了书，书名《中国的黎明》，分送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地去出版。

这之后，她利用回美国之前的间隙时间访问了北朝鲜，从朝鲜到了莫斯科，因为这时回美国，莫斯科是必经之路，而且她也想在莫斯科停一停，安排出版她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可是莫斯科没有人愿意出版她讲中国的书，莫斯科的主要报纸也不愿意登她写的中国的文章。这时她亲自到东欧去安排出版她的书。她发现相当有人对她讲中国的书很感兴趣。她把书安排到了七、八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出版：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巴黎、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等，都欢迎她的书。

一九四七年底，斯特朗在回美国的途

中，路过巴黎，遇到了刘宁一等中国同志。他们邀请她再来中国。当她在美国旅行演讲并安排出版她的书，《明天的中国》之后，计划从莫斯科再回到中国。可是自从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在莫斯科申请前来中国的出境签证以后，等了四个多月，没有得到签证。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她被诬为间谍而被捕，并于五天后被赶回美国。这以后的六年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共产党愿意同我说话”。她在欧洲各地安排出版的书，都停止了出版，已经出版了的也停止发行。这以后她也不可能再到别的国家去访问。但是就在她被驱逐以后的一九四九年，她又更进一步以充实的材料系统地写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中国人征服中国）在美国发行。

一九五六年莫斯科为她平反，说原来对她的控告“没有根据”。这以后她逐渐同外界恢复联系，并再次得到中国的邀请。但是这时美国政府却不发给护照。为了出国，她又奋斗了三年。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她才最后到达了“早在十年前就已出发”前来的目的地——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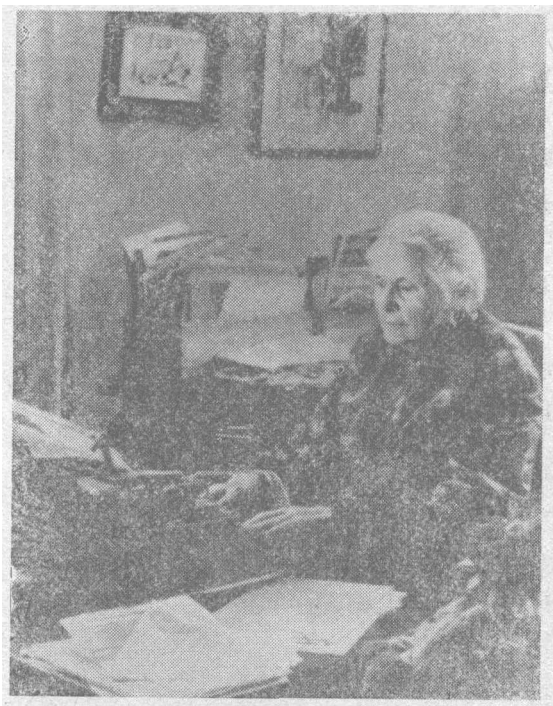
在此以前，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间，她在美国办了一个油印刊物“Today”（今天），讨论国际时事，特别重视中国情况的发展。

一九五六年，她还在美国出版了“The Stalin Era”（中译本：《斯大林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再版），总结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伟大成就和一些缺陷，分析了在苏联产生某些坏事的多方面的原因，以澄清由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而在国际上引起的思想混乱。她的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令人敬佩。

（五）

一九五八年斯特朗终于回到了中国，定居北京，实现了多年的心愿。她在中国找到

了她要做的工作：为美国人民写中国革命，也为世界上对此关心的任何人而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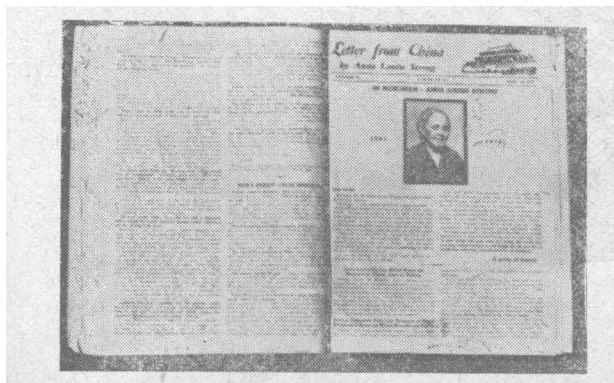


她一到中国就去各地参观访问。一九五八年正是人民公社兴起之时，她把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了“The Ris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Communes”（成长中的中国人民公社）。这以后，她继续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一九六三年又写成了“China's Fight for Grain”（中国为粮食而战）。一九六四年她又集中整理了几年来调查材料，把一九五九年写的那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补充修订，内容增加了一倍以上。

一九五九年斯特朗去西藏旅行，她在七十四岁的高龄，登上了布达拉宫十三层高楼的顶端。她是当时唯一看到了拉萨的美国妇女。她把自己辛勤采访的结果写成了两本书：“Tibetan Interviews”（西藏述闻）和“*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西藏农奴站起来了）。

她来中国后还不断向国外报刊寄送文章，报道她所见到的中国情况。看到她的文章，知道她在中国人民越来越多了起来，

给她来信，问她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起来。起初她为了减少重复写信答复同样的问题，就把回信用复写纸一次复写两三份，分寄给不同地方的来信人。后来需要答复的信越来越多了起来，单靠打字机一次复写几封回信的办法已经不行了。自一九六二年九月起，她开始向国外寄发油印的“中国通讯”。第一期油印了六十份，发出后来要的人很多。第二期、第三期谈中印边境冲突，就增印到二百份。澳大利亚、新西兰、雅加达、科伦坡和加纳等地的报刊都转载了它。随后寄发的份数不得不继续增加，第五封信开始铅印，需要“通讯”的信件仍象雪片般飞来。有些外国朋友，愿意将“通讯”义务地翻译成不同文字，向不同地区和国家印发。有些人为了凑集邮费，扩大寄发“通讯”，甚至在自己的朋友间募捐。后来它就以六种文字发行四万份以上。她的“通讯”发行到了许多她过去没有去过，以后也很少可能去的国家；发行到许多她只听过名字，但所知很少的民族里去。她自己有时也感动地说，“我的读者从来没有这么广泛！”人们这样支持她的“通讯”，使她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通讯”的继续写作上。直到她逝世，她一共编写了六十九期“通讯”。前三十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过汇编本。世界各国报刊转载她的“通讯”的不计其数；直接把她的“通讯”翻印发行的更不知有多少。



(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是很不平凡的一生。她以毕生的精力探索人类前进的道路。她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特别是在她的后半生，她的心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热爱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她在增进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她的一生中，她写了三、四十多本书，几十种小册子，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究竟写过多少文章。她的文笔犀利，绘声绘色，写出的文章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她的一生中，她经历了“三种文明”——美国文明、苏联文明和中国文明。她说“我一生的头三十年是在美国西部度过的，在那里我们为争取更好的民主形式，为争取妇女权利和劳工参与政治，为反对‘华尔街章鱼’与争取公用事业的公有制而斗争……”。“一九二一年我到了莫斯科……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我极为振奋……”在她的后半生中，她逐渐地更看清楚了中国的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世界人民的命运是和中国革命紧紧相联的。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革命的真相。她相信“中国革命，是这个世纪中伟大的反帝革命，无论是在它的成功还是失败的方面，都提供给世界其他反帝革命所希望吸取的最好的教益”。在她那许多重要著作中，字里行间都浸润着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汗所凝结的革命经验。

她那旺盛的革命精神和充沛的精力也是非常感人的。当她在七十二岁的高龄最后回到中国来以后，她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的热爱，成了她生活中的最强大的动力。她曾兴

我在中国的经 历

〔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一九二五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我已四十岁，正好过了前半生。我一生六次访问中国。访问的时间都选择在发生某些重大而明显的革命变化的时期……

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初乘最后几架美国飞机中的一架离开延安的。“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否则你会走不了。”毛泽东当时对我说，“你不能去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已经得到了关于我们的全部材料。等到我们再同世界联系时，你可以回来。”他认为，这“大约在两年之内”可以实现。

当我离开延安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这主要是在延安讨论各种问题当

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胸在不断开阔……

一九五八年八月，我终于到达了北京，为了要到北京，我早在十年前就已出发了。

我找到了为此而来的工作：那就是为我的美国同胞们来写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为世界其他各地对此有兴趣的任何人们而写中国革命……

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提出想留在北京时，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希望学习和写作。”我现在还在学习和写作，并且希望继续学习和写作下去。

（节自1980.3.27《人民日报》）

奋地对她的朋友们说：“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所走的道路。我要学习，要写作。”在她最后的几年和十几年来，她仍然总是孜孜不倦地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写作。当她逝世的前一年，病到医

生只许她卧床休息的时候，她还要一天工作六小时，精心撰写她的回忆录：《新中国的第二个十年》。但是病魔终于夺去了她的生命，使她没有能完成她的这一最后心愿：写好她的这本书。

